

红色便衣保卫队喋血护京城

——粉碎国民党特务暗杀董必武的阴谋



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中)

新中国成立前夕，考虑到进城后保卫党中央的需要，中共中央专门组建了一支150多人的便衣队。进入北平后保卫队员们是如何隐藏身份，在异常复杂的情况下坚守岗位、努力完成任务的呢？

17岁小队员假扮小商贩

便衣队到达北平后不久，为了工作方便和隐蔽真实身份，许多干部和队员都有一个公开的职业身份，如便衣队长高富有就兼任了颐和园管理处的主任，副指导员沈平则担任了北京饭店的副经理。

在香山到西直门这一中央首长们经常经过的路段的沿线，有不少便衣队队员在各监控点当起了小商贩、商店学徒、修鞋匠、三轮车夫等。在颐和园内的听鹂馆餐厅，则派了便衣队队员出任经理、伙计。在颐和园后山开设的照相馆、茶馆里，一些跑堂的和照相师傅也是由便衣队队员担当的。

高福禄是便衣队里的小队员，当时刚17岁。他自幼生活在山西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当过儿童团团长，站岗放哨、送鸡毛信，后调入便衣保卫队。一天晚上，高富有找他，要派他去颐和园前宫门口当小商贩。高福禄一听，急得连声说：“不行，不行！城里的事我什么也不懂，干不了。”高富有也认真起来：“进城前你不是向组织写过决心书，说誓死保卫党中央吗？怎么让你去摆个小摊，就胆怯了呢！”便给了高福禄100元钱本钱。就这样，高福禄每天早晨在颐和园门前出摊。

一天早晨，高福禄听到有人说在圆明园附近的三仙洞里发现了一具穿解放区干部服的尸体……高福禄意识到死者很可能是被敌特分子或坏人杀害了的干部，便当即报告。

在这之后，北平市公安局六分局派人前往辨认，确认死者为十八区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的一位干部，是被枪击而死，凶手还拿走了他随身携带的手枪。郑六分局局长张锋组织了专门侦破组，

很快便将该案凶手、国民党军二〇八师特务李克勤抓获。

粉碎暗杀董必武的阴谋

在青龙桥联合检查的韩福太等便衣队员，在清理敌伪文件时，发现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在青龙桥一带活动的一些线索，立即提供给郊五分局。郊五分局按韩福太提供的线索，有针对性地对已抓获的两名特务进行复审，摸清情况后，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对这一中统特务组织的首恶和顽固分子依法抓捕惩办，对其组织中的一般成员逐一登记，教育后加以控制管理，消除了一个重大隐患。

经过肃特反霸、收容散兵游勇等工作，香山地区（包括香山到西直门这条路线）的社会治安状况有了明显好转，对于保证党中央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便衣保卫队还与公安部门紧密配合，协同侦查，及时破获了多起敌特分子妄图制造的暗杀恐怖活动。如柴氏兄弟案：柴氏两兄弟皆为国民党用重金雇佣的职业杀手，他们利用跟踪侦察手段，发现了当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的家庭住址。董必武当时住在西城区西皮市胡同，即人民大会堂西侧。董必武家离办公处很近，为节约开销，他每天下班后就徒步回家。柴氏兄弟暗中跟踪，摸准了董必武上下班的活动规律，正准备实施暗杀时，被公安部门迅速查获，柴氏兄弟被一举抓捕。

忍辱负重执行命令

为了使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万无一失，在香山地区的

要害地方均由便衣队的人值勤。在香山设立交通检查站，是为专门负责检查进入香山地区的车辆和分流、疏导来往车辆的。由于位置重要，在这里担任值勤的交警，都由便衣队的队员担当。

当时还没有人民警察的制服，在这里值勤的便衣队员都一律穿原来国民党警察的那身行头，即一身黑制服，头戴黑色大盖帽。就因为穿着这身行头，让队员们挨了不少辱骂和奚落。

一次，便衣队员在青龙桥检查站值勤时，从颐和园方向开来一辆拉灵柩的大卡车。一名队员示意这辆车停车接受检查，但司机欲强行通过。这位队员不顾自身安危，挡住去路，把这辆车拦了下来。

司机下车后大嚷道：“你们这些国民党‘黑狗子’，欺负老百姓欺负惯了，现在解放了还想欺负人……”说着就朝便衣队员的脸上打了一巴掌。

便衣队员遵照解放军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规定，没有还手，也没有解释自己的身份，而是有礼有节地说：“现在我是人民的警察，执行的是人民政府给我的任务，你必须接受检查，否则就是不遵守人民政府的规定。”

司机一听这话，意识到自己的举动过了头，接受了检查。

后来，汪东兴等领导了解了此事，协同有关部门查清了打人司机的情况，原来那人中央办公厅一位工作人员的亲属。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知道此事后，还表扬了那名便衣队员，说每个便衣队员都应当有这种政治素质。之后，李克农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责成中央办公厅的那位工作人员领着司机向被打的便衣队员道歉。

(摘自《党史博览》)

乔冠华上中学时曾三次被开除



乔冠华(左一)1971年出席联大会议时畅笑的经典镜头。

新中国第四任外交部长乔冠华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那独有的才气和风度令人折服,尤其是在他开拓新中国外交事业方面留下了一串闪光的足迹和骄人的业绩。

1925年，乔冠华考入了江苏盐城的由美国教会办的一家中学——淮美中学。这时正值北伐革命风起云涌。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争取民主自由的进步思想，广泛深入中国广大民众。学校学生会里有不少学生是中共地下党成员。党的外围组织是读书会，经常组织师生阅读进步书刊。乔冠华深受影响，积极参加读书会的各种活动。他和进步师生一起参加革命活动，上街游行，强烈要求取消《圣经》这门必修课，反对由帝国主义分子把持学校，提出驱逐洋校长的口号。后来，国民政府下令，开除所有带头闹风潮的学生，乔冠华也在其中。

于是，乔冠华转人家乡的亭湖中学念书。尽管当时亭湖中学思想比较进步，但办学还是旧的一套，特别是校长宋武真十分专横。学生们对一个姓张的历史教员的课不满，提出更换教师的要求，可宋武真不答应。乔冠华等人商量罢课三天，以示抗议。结果宋武真纠集县教育局，强令学生复课，并开除了为首的几个学生，乔冠华当然不能幸免。

乔冠华两次被学校开除回家，父亲很生气，决定不让儿子继续上学，要他到镇上的一个店铺去当学徒。乔冠华坚决不从，绝食以示抗议。父亲只得送他到淮阴的淮安中学读书。在那里，乔冠华读书用力，才华出众，被同学们推选为学生会宣传部长。当时淮安中学的校长叫王中慈，是个专制霸道的小官僚，对师生实行家长式统治，引起大家的不满，于是学生们开始罢课示威，要求撤换校长。乔冠华起草了反对校长专制的声明、宣言。结果，学校当局勾结县教育局出面镇压，把领头闹事的乔冠华等十几个学生开除了。没办法，乔冠华就去找在中南中学当校长的本家乔东凡，经考试跳班插高三最后一个学期。

前后算起来，乔冠华初中、高中一共只读了3年，最后仍以优异成绩取得高中毕业文凭，其时，他仅16岁。

之后，乔冠华留学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初随周恩来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同年底赴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部长等职。1976年后，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

(据《周末》)

梅兰芳自揭失误

新中国成立初期，梅兰芳在北京政协礼堂演出《凤还巢》，当中有一段“遵父命在帘内偷窥才郎”的唱腔。那天，梅兰芳唱到这一段时，比平时少唱了一句，而在表演上多了几个看穆居易时的羞涩动作。场上的演员以及看到梅兰芳表演的剧团人员都认为，这是梅兰芳为加强表现人物偷看时的羞涩感，故意把唱词省略了。

演出结束后，当大家纷纷称赞梅兰芳的改动非常好，向他表示祝贺时，谁知梅兰芳却淡淡地笑了笑说：“今天不是我改得好，是我一时失神，把那句唱词忘了，没有办法才用动作把这个没唱出来的腔遮盖过去，这是一出演了多年的经典剧目，我真是对不起观众！我应该向大家检讨。”

梅兰芳的话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后来，有朋友对梅兰芳说：“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梅兰芳认真地回答：“人的失误都是有原因的，小失误往往潜藏着一个人的人格缺陷，比如这件事，我上了台怎么能失神呢？还是本身有问题，说到底，是没把演出放在第一位，没把观众放在第一位。只有放大了认识，才能还其本来面目，看清危险，警示未来，才能有长进！”

(据《文摘周报》)

何应钦曾遭日本人两度暗杀

何应钦是出了名的亲日派。可他曾遭到过日本人的两次暗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将铁蹄踏向华北。为委曲求全，何应钦于1933年与日本签署了《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把察北、冀东的大片国土拱手送给了日本。但这未能满足日本人的野心。1935年2月，日本大本营密电关东军司令，指示“适当刺激一下中国军方”，诱华北守军做出反抗或变相反抗，为扩大侵华战争制造借口。关东军司令南次郎大将遂召集他的特工人员反复策划，决定暗杀何应钦，以激怒蒋介石和中国华北守军。

南次郎把暗算何应钦的任务，交给了经验丰富的特务酒井恭辅和清水次郎。1935年2月二人潜入北平后，清水次郎化装成叫花子，在何应钦官邸门口讨饭，他可怜的扮相和足以乱真的河南话，蒙骗了何应钦的手下参谋屈从松。出于“老乡”的怜悯之心，屈竟把清水领进了官邸大伙房，让厨师弄了些剩饭给他吃。清水在伙房混了两个小时，了解到何应钦的许多情况。

2月的北平，天气还很寒冷。何应钦办公室的取暖主要依赖木



何应钦

炭，由官邸的伙夫每半月直接从市场上购进。酒井、清水决定将炸药制作成木炭形状，混在木炭中，弄进何的官邸。酒井扮成卖炭小贩，3天内就顺利地吧木炭卖给了何应钦官邸的采办员，并亲自把木炭送到了何的官邸。

木炭购进后暂放在伙房门口边，干活的不小心泼了一盆泔水，使木炭表面沾了一层油垢，看上去色泽质劣。何应钦对木炭很在行，一看颜色，就下令把木炭扔掉。日本的第一次暗算计划流产。

酒井、清水二人并不死心，他们决定从何应钦官邸收买内奸。此时，他们想起了“老乡”屈从松。屈是何应钦的中校作战参谋，很

受信任，但此人贪赌好色，爱收藏古字画。酒井、清水决定以重金收买他。关东军司令部除提供定时毒气器皿外，还给了20万元活动经费。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清水将20两黄金放在屈的面前，直接说明了两本意，并最终使屈就范。

两天后，屈从松得知何应钦从南京开会回来，急忙到办公室准备文件让何批阅，并调整好毒气器皿的定时装置，之后走进何的办公室，假装不小心将文件掉到地上，趁弯腰去捡时，把毒气器皿放到了何的办公桌下。没想到，毒气还没打开，何应钦就乘车外出。屈从松急忙找借口溜回办公室，取回了毒气器皿。几天后，屈从松故伎重演，但这次恰逢何在东京振武学校的老同学加藤忠康来访，何步入了会客室。结果毒气按时打开，毒死了一名副官。

何应钦得知情况后，急令警卫处长严加追查。屈从松全盘招供。半个月后，他被南京高级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何应钦尽管痛恨日本关东军对他策划的暗杀阴谋，但迫于日军的淫威，又顾及蒋介石的政策，于1935年6月与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签订了《何梅协定》。

(据《老年生活报》)